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

——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陈佳旻 李桂荣

【摘 要】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关键词】文学叙事;跨学科;小说“多重叙事”;“双重叙事动力”;“隐性进程”

【作者简介】陈佳旻,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李桂荣,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江西社会科学》(南昌),2024.2.98~106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小说叙述中的冲突与和解”(21XNH161)。

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提出“悲剧六要素”^{[1](P11)},开启了“情节论”下的西方文学叙事分析传统。20世纪早期,“语言学转向”使“叙事”的普遍性在各领域备受关注,并带动了跨学科叙事学的发展;20世纪末,“文化转向”使文学独特的表意机制受到各领域的重视,同时,“各领域对文学理论(尤其文学叙事)的应用与创新证明了学术界‘文学转向’(literary turn)的发展趋势”^{[2](P7)}。一方面,文学“经典叙事学”对语言结构、修辞手法和文本策略的关注启迪了其他学科的创新发展,为自身迎来大量受众的同时也受到来自各领域的“挑战”;另一方面,文学的关注点也在几次转向中从“文本内的语言建构”转到“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再到“内外互相补充”的“后经典叙事”发展阶段。^[3]可以说,叙事学从文学中来并以文学叙事研究为核心进行超文学领域的理论扩建与发展。尤其是2000年前后,随着叙事学整体的蓬勃发展,其他非文学叙事——如法律叙事、经济叙事、政策叙事等,通过借鉴文学(小说)叙事的个体人物聚焦和情节化叙事特点,将社会组织运行的复杂

逻辑与(小说)个体情节下的具象描述相结合,实现了复杂、抽象理论的有效表达。

社会学家芭芭拉·查尔尼娅维斯卡(Barbara Czarniawska)在《组织研究中的叙事方法》中提出,“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的核心关切是组织生活的“集体本质”(collective character),与文学叙事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关切不同,各有优势。^{[2](P6-7)}对此,芭芭拉提出将人类学、文学的理论 with 制度主义相结合,使组织研究贴近文化和文学研究,以实现集体考察与个体观照的融合。此外,2013年,生物神经学家佩斯·斯科特(Pace Schott)在叙事结构与大脑运作机制的关系中发现,梦境——涉及角色、背景和层级事件结构——出自讲故事的本能,进而提出“梦境叙事”的大脑机制^[4];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在《叙事经济学》中,将“叙事”引入经济学领域,将过去依赖于抽象建模和数理统计的经济学还原到有温度、有感知的生活切片或历史场景中,使人们的言谈、议题和故事成为解构经济现象的重要参考。上述不同领域通过叙事研究实

现本学科的创新发展,首先是基于对“叙事”这一人类普遍思维方式的重视;其次是对学科思维特殊性和惯性的考察,进而突破其发展的局限性。

2010年以后,中国叙事学也进入“大繁荣时期”^[5]。现阶段,中国叙事学研究表现出多样发展的态势,除了早就有所发展的电影叙事、新闻叙事、教育叙事等,近些年也出现了政策叙事、法律叙事等新的研究方向。各种非文学叙事研究通过对文学叙事方式及其效果的重视,尤其是对文学叙事中“情节”和个体人物视角的借鉴,实现了各自领域的创新发展,推动了“泛叙事”发展浪潮。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在《竞争中的叙事:叙事转向中的又一转向》中提出,在泛叙事的发展中“我们不能再将叙事认为是某一两个学科的合法财产”,并对文学叙事提出了疑问,“我们该在叙事的跨学科研究中有何作为”。^[6]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一方面取决于文学叙事的本质及其与当前社会发展需求的关系;另一方面取决于小说叙事的特点及其与现代人类自我实现的关系。对此,本文将以当代小说为聚焦,论述小说“多重叙事”如何在跨学科互鉴发展中,通过“以大观小”的方法论实现“以小见大”的小说审美效果;在论述中国叙事理论“双重叙事进程”如何突破亚里士多德“情节论”的基础上,提出“多重叙事”下“重重洞悉”的中国审美与“多元化统一”的意义建构方式。

一、文学叙事与其他叙事的互鉴发展

跨学科互鉴发展的前提是要坚守本学科研究的本质属性与核心目的。韦勒克(Rene Wellek)和沃伦(Austin Warren)提出,“文学的本质问题”在于文学研究的特殊性,如果忽视这种特殊性让不同学科研究间的差别消失——“在文学中引进一些无关的推测,文学的价值便只能根据与它毗邻的这一学科或那一学科的研究所提供的材料来判定”^{[7](P99)}。文学的特殊性首先在于语言的特殊性,即“文学对比日常和科学语言用法的区别”^{[7](P11)}。文学语言属于非直指性语言,而科学语言则是“直指式的”,“它要求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吻合”,它是“一种符号代替另一种符号”——一种“简洁明了的语言符号”——不假思

索便可以明确所指对象;同时,文学语言具有“高度内涵”并且还表现“情谊”;虽然“日常语言也表现情谊,但表现程度和方式不同”——“日常语言往往着急达到某种目的,以影响对方的行为和态度”。^{[7](P10-11)}其次,文学语言对于语源的发掘和利用更加用心、更加系统——“每一种艺术作品都必须给予原有材料以某种秩序、组织或统一性”^{[7](P12)}。通过分析文学语言形式的特殊性及其内容中虚构与现实的交错,韦勒克和沃伦提出文学美学在于,“多样中的统一”“无为的观照”“美感距离”“框架”以及“创新”“想象”“创造”等,其中,每个术语都只能描述文学作品的一个方面——没有单个术语本身就能令人满意;因为“一部文学作品不是一件简单的东西,而是一个交织着多层意义和关系的极其复杂的组合体”^{[7](P16)}。由此可见,文学语言的表意方式是复杂的“多样性统一”。因此,对文学语言的分析是对“多样”元素与内涵的解构和在“统一性”基础上的再建构,以使文学语言意义不断延续。

其实,文学叙事研究与其他社会科学叙事研究的不同表现为“人论”(Human Being)与“人因”(Human Factor)两种分析方式的不同。以《叙事经济学》为例,希勒认为,叙事对经济行为至关重要,因为叙事承载的“非理性因素”对社会经济运行起关键作用,即经济活动并非纯客观、理性地运行与发展,而是很大程度受到“人因”(主观情绪、感受等)影响。而影响经济叙事效果的正是“与经济环境互动的人类元素(human elements)”^{[8](P31)}。可以看出,叙事经济学研究的本质是行为经济学——把叙事及其引发的情绪效果当做影响人类经济行为的变量。然而,文学叙事研究目的是对存在意义的探讨——经济目的并非文学的核心关切,经济在文学研究中更多表现为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或实践手段,而非最终目的。经济学对叙事的关注,是对经济体客观运行规律中(人作为)“非理性”因素的重视。“人因”研究把“人”作为社会组织运行中的变量,其直接目的是对经济、政治等社会组织运行规律的把握。与截然不同的是,文学研究以及文学叙事是把人(human being)作为

目的本身的“人论”(Human-Being)研究,即以发现和解构人的存在及意义为目标,社会组织则成为人存在与发展的条件或影响因素。此外,在研究实践中,“人论”与“人因”两种分析方法往往共存于同一研究问题中,只是不同学科的侧重比例不同。前者更多表现为一种应然命题,即人应该怎样存在发展;后者更多表现为一种实然命题,即人是怎样的存在。钱谷融提出“文学即人学”,文学的“主要任务是改造现实,使人们生活得更好,而不在于反映现实”^[9]。因此,文学研究以及传统文学叙事分析更多表现为“人论”研究下“应然”命题的解答,其他社会科学则更多表现为“人因”研究中“实然”命题的探讨。

文学叙事研究与其他科学叙事研究本质和目的不同导致研究方法截然不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研究发展中首先注意到了这一点,并通过借鉴文学研究成果推进自身学科发展,掀起了“泛叙事”浪潮。立于跨学科互鉴发展的历史潮流中,面对费伦给文学叙事提出的问题——“我们该在叙事的跨学科研究中有何作为”^[6],笔者认为小说“多重叙事”的研究需要深入与细化,即在文学人本“应然”命题的解答中,加入对经济、政治、法律等社会组织运行规律为代表的“是然”命题的解构。具体方法是,在文学叙事分析中不仅把人当作叙事主体来理解人与社会的主客关系,也把社会组织当作与人并行存在的叙事主体,理解社会组织运行与个体发展间不同的关切和运行逻辑;通过对个体人的观照和对整体组织运行的认识,实现对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全面认识。费伦提出,过去叙事的研究方法都属于“个体叙事”(individual narrative)分析,对此,费伦主张“叙事竞争”,即在叙事建构中,不仅分析一种叙事的逻辑,也要找到与其存在“潜在竞争”的其他多样叙事(multiple alternative narrative)。因为每一种个体叙事模式(或故事版本)都是基于某种倾向和目的,不同目的下叙事会出现竞争。因此,费伦也呼吁,通过将个体叙事置于多个叙事选择的潜在竞争中,以实现事件和经验更全面的认识,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分析个体叙事,而且有助于我们用各种方式解读不

同叙事”。^[6]

二、基于“小说”的特殊性提出“多重叙事”

文学叙事创新的关键是,针对本学科叙事思维惯性和局限性做出符合当代社会发展需求的方法论调整。小说是众多叙事形式和体式中具有特殊性的一种——它是一种语言(文字)叙事,是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文学品种”^{[10](P127)},即当代文学叙事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要弄清小说叙事的特殊性,就要在“小说”和“叙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中,找出小说与叙事的天然联系及其特殊性。

首先,“小说”的特殊性体现在“小”与“说”。《说文解字》中:说“释也,从言兑。一曰谈说”。“说”主要指“交谈”,强调交换语言为载体的信息;“小,物之微也”,即物体细微的特征。“小”限定“说”,表明其语言表达内容和方式的细致、微妙,与之相对的是抽象、宏大。根据小说的本质属性可把小说叙事归纳为“细微”叙事。“细微”意在强调与其他文学叙事对比,小说更注重细节描述和个体视角下的微小聚焦。细微叙事使小说具有更强的逼真性与代入感。同时,细微叙事也意味着与“大”叙事或宏观叙事相比,小说的表面情节表现出对世界整体性和人类组织性描述的相对匮乏。因为,小说细微叙事对个体视角体的聚焦,使故事首先呈现为以个体为中心的人物生存状况;而现实生活是在社会系统中运行,个体并非现实生活的中心——只是存在于无数个体连成的复杂网状结构中的一个点。因此,如果没有多重叙事逻辑建构下的整体框架,小说细微叙事则会表现为琐碎叙事或个体中心主义叙事。如果不能以系统性和多重性的思维模式解读小说,就会发现小说文本现象与现实社会现象有别,小说阅读也就停留在了文本内的体验与认识,无法实现对现实的全面认识与指导。费孝通在论述人学与交叉学科的问题时提出:“原来只是在小说里看到有关人际关系的描述,但实际生活当中的情况却要比那复杂得多。”^[11]这表现出小说阅读与分析的常见方式,即以情节逻辑和个体人物关系为中心。费孝通作为社会学家和人学家,其专业思维模式使他觉察到这种阅读方式的局

限性,于是提出“光看不行,为了要开阔社会视野”,“要到人类学当中去找方法”^[11]。小说的“光看”指局限于情节中个体间人际关系的看,即只在情节故事中看表面人物关系;“不行”指对现象认识的客观性和全面性的“不行”,即此阅读方式对获取客观且全面现实经验的“不行”。因此,需要“开阔视野”——采用不同的视角与思维方式,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以突破固有思维与认知的局限性。对于文学(又称作“人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思维逻辑与研究范式都是适合借鉴的研究方法与创新支点。

其次,无论古今中外,小说一直未变的一个特性是“虚构性”,即英文小说(fiction)的含义。中西方小说都可追溯至神话与民间传说,经历了从全神话、准神话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过程。小说是人类社会的文化产物,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产生的特殊叙事方式与内容,它随社会条件和人类叙事动机的变化发展而不断演变,最终形成现代形式的小说,即虚构文学(fiction)。小说首先是作家的认知与感受对现实经验材料的处理,并按照某种秩序(如情节逻辑)把材料碎片整合成彼此融贯的整体,进而形成“文本内真实性”,也是虚构场域内的真实性。因此,读者在小说虚构场域中所体验到的“真实”,是一种虚构或人造的“真实感”,它可以引发读者的现实经验与感受,进而引导读者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与意义建构。小说叙事动力在“文本叙事动力”与“读者叙事动力”的互动中形成。^{[12](P6)}前者以文本内真实性为基础,后者在前者的带动下实现对文本外真实性的解构与再建构。可以说,文学是通过处理现实材料而产生美学价值的语言空间——文学空间是虚构的,但空间内的感受和认知是真实的。因此,文学的美学体验在虚构形式和真实材料的双重性中实现,即“虚实相生”。

再次,作为现代艺术形式的小说虚构与古代神话虚构不同,小说虚构凸现代认知与审美。小说是一种我们当作是真实的存在——即使我们知道那不是真实;而古代神话被当作真实,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如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所言,

文学读者与文学作品形成合作原则——“读者愿意解读那些违背有效交流原则的语言成分,试图发现一些深层交流的目的”^{[13](P27)}。同时,小说的虚构特质表现出叙事建构的“主观能动性”和“虚构主义”原则。主观能动性指小说叙事对“文本内真实性”的建构,取决于其“内部各元素的融贯一致”^[14]。因此,文学空间的自足性使文学叙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实用主义”(pragmatism)指一种理念在实践中被发现是有用的,进而证明它在理论上的真实;“虚构主义”(functionalism)指一种理念在理论上既不真实也不正确——即被认为是不真实的,却不会因此而被视为无价值,此种理念中,即使其理论上无效却被视为有实际重要性。综合这两点,小说叙事的虚构既体现出作者能动的建构,也体现出读者能动的解构,即挖掘虚构中的真实。解构“虚构”就是解构隐在“真实”。

综上,小说的“多重性”体现在叙事方式的“以小见大”和形式内容的“虚实相生”上。小说“多重叙事”建立在文本内外双重“真实性”和“以大观小”方法论的基础上,从更广的叙事维度和视角来理解内涵意义,实现“以小见大”的小说审美效果。此外,“多重”概念,一方面翻译成英文“multiple”(多维度),本文具体指个体、群体和国家的叙事主体划分;另一方面“多重”援引自中国审美概念“重重悉见”。重重悉见的观照角度和表现方法来自中国古典山水画的审美方式,即从多视点反映物象全貌,诗画交融。从叙事的角度理解中国绘画审美的“重重洞悉”实则作为一种整体结构观,即人是山水中的人,个体是环境中的个体。人的情绪抒发靠山水环境描写展现,个体呈现要在整体结构中实现。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书画卷中提出“以大观小”之游观的山水画法。沈括批评李成“仰画飞檐”(用固定 viewpoint 的看法)错误:“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一重山,岂可重重悉见?兼不应见其溪谷间事。又如屋舍,亦不应见中庭及后巷中事。若人在东立,则山西便合是远境;人在西立则山东却合是远境。”^{[15](P182)}沈括“重重洞悉”的山水画法包含“多重叙

事”的逻辑内涵——人在不同方位的视角发现不同的“远境”，因此需要更多或全方位视角表达人与自然的多重融合与浑然天成。同理，小说中的“远境”，即文本的隐含信息或“隐性进程”，它会随(认知或情感等原因形成的)特定视角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多重叙事”为突破单一视角和思维模式，在整体把握下实现对小说人生的“游观”与“重重洞悉”。根据小说个体人物聚焦和细微叙事的特点，其“远境”首先表现为“大”群体叙事和“大”组织叙事。因为小说故事一般通过个体代表群体，通过个体或群体象征组织，只有建构更大的叙事逻辑(如群体叙事、组织叙事)，才能把握个体人物和事件的代表性和象征性，挖掘小说中的“远境”或更大的真意。

最后，从小说叙事逻辑内涵出发，“多重叙事”一方面指文本内部对小说情节和内涵意义的“多重叙事”；另一方面指小说文本内外现实间的“多重叙事”，即文学叙事与其他叙事在现实事件与经验中的竞争与对话。第一方面，文本内部以叙事主体为划分维度，对小说文本进行个体—群体—国家多重主体逻辑下的解读，多维度呈现现实事件背后不同主体下的视角体验与逻辑思维，增进读者对事件和经验实现更全面的认识；同时多重叙事之间彼此融贯，使读者通过个体叙事的具象性理解集体叙事的抽象性和复杂性，反过来，在集体的特殊结构中重新认识个体的普遍追问；引导读者在个体—群体—国家多重叙事的对立统一中实现“自我整合与社会组织的互相补充”。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对于人的自我认

同与发展提出，“我们要跨越一道鸿沟，必须找到社会形象与生物动力之间的联结”，“这种联结不仅仅是指社会形象和生物动力在通俗意义上的互相影响，更是指深层的群体与自我、族群认同与自我认同(特别是自我整合与社会组织)的相互补充”。^{[16](P22-23)}第二方面，通过文学形象和故事情节在文本内外形成多重叙事进程和“互文性”关系，使文学叙事与政治、历史、文化等其他叙事在现实经验上实现“竞争与对话”，通过文学叙事的多重性揭示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背后的个体经验、文化渊源和哲学追问。

三、“多重叙事”对“双重叙事”和“隐性进程”的借鉴

基于对国内“多重叙事”及其他相关主题研究发展状况的考察，根据知网文献检索数据(如表1)显示，“双重”“三重”“多重”叙事研究大体上始于2000年前后，相关学位论文较少，其中，“三重叙事”和“多重叙事”的图书发表量为0，学位论文有限，说明相关思想尚未体系化和理论化。

据知网数据库检索(表1)显示，“多重叙事”研究早于“三重叙事”，同时，“双重”和“多重”的研究总量都分别多于“三重”。具体分析，早期“多重叙事”与“双重叙事”“三重叙事”为同一概念，前者未固定衡量叙事的范围和边界(多于单一叙事模式即可)，后者更聚焦于两种或三种类型分析，总体上都是一种超越单叙事的表达。“多重叙事”研究属于总叙事研究中的一小部分，侧重叙事及其所引导认知的多重性。无论从内容还是发展顺序，“多重叙事”都是在

表1 知网检索各类主题文献的发表总量和发表时间数据表

检索主题	总库	学术期刊	学位论文	博士论文	图书	最早研究时间(前20篇)
小说	42.41万	25.66	6.42	5700	245	1927-1954
叙事	17.51万	10.30万	4.59万	3853	147	1953-1961
小说叙事	1.35万	8583	2868	333	41	1982-1988
双重叙事	484	341	60	2	3	1991-2004
三重叙事	251	136	85	32	0	1998-2009
多重叙事	354	256	34	3	0	1988-2008
小说多重叙事	85	65	7	0	0	1988-2008

“双重叙事”理论基础上的延伸与细化。所以,下文将详细论述“双重叙事”的研究发展和现有“三重”和“多重”叙事中的新发现与新问题。

目前国内现有的“双重叙事”或“多重叙事”研究都表现出对隐性进程或隐含信息与意义的重视。如隐含视角中的内容、隐性的文化意识形态、隐含的社会历史原因、隐含作者的表达等。由于不全面的视角、特定历史社会结构或文化意识形态等原因而被隐藏或忽略的内容,通过不同分析方法呈现新内涵,实现对原有单一叙事的超越,进而形成多重叙事内涵与逻辑。2013年,申丹提出“隐性进程”及“双重叙事动力”,^[17]并在此基础上于2021年出版了关于多重叙事理论的专著《双重叙事进程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了关注与探讨。国际学者重点关注了该理论中的“隐性进程”(Covert progression)概念,在肯定其创新性的同时,也就基于该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的区别提出了问题,并由此产生关于中国“双重叙事动力”理论的国际性对话。^[18]

首先,申丹提出“隐性进程”突破了亚里士多德以来“情节论”,一方面表现在其关注与情节“疏离”或“逆反”的文本内信息,如明显不同于情节书写的主题和人物形象;另一方面表现在其关注并重组“局部文本”,即“对情节无足轻重或相冲突的文本”^{[19](P22-23)}。这两点与古思“隐匿叙事”的内涵相似,即隐性的挖掘在于对那些看起来“无关紧要或不甚明了的细节”的重组。^{[19](P23-26)}但两者挖掘隐性信息的目的或效果不同——“隐性进程”不是对围绕情节的内容与主题的补充,而是对整个小说“文本意义”(而非情节意义)的完整性和深厚性的挖掘。因此,两者区分的关键点取决于“情节”的定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情节是行动的模仿——‘情节’指事件的安排”^{[1](Pxxiii)},即事件组成情节,同时事件是通过人的行动呈现的。行动(action)与事件(events)对应,为区别诗人和历史学家不同呈现方式而提出,因为诗人的“呈现”(representation)是对行动的呈现。亚里士多德对“情节”(行动模仿)的重视,源自他对“悲剧效果”(the effect of tragedy)及其成因的关注。他说,“如果

有人提出一系列表达道德品质、风格优美、思想丰富的演讲,(没有行为)就不会达到悲剧的效果。一部缺乏这些元素的悲剧,只要它有一个故事和一个结构化的情节,就会更有效”;“故事是悲剧灵魂的基础,道德品质(character)是其次”。^{[1](P12)}“其次”(second)指叙事功能,即直接造成“悲剧效果”的影响力,而非重要程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道德和性格通过行动影响悲剧结局,所以对于悲剧的呈现效果即所引起的“悲剧情绪”来说是“其次”。这与现代小说叙事学关注点不同,如福楼拜的艺术的最高目标“不是引起笑声或眼泪”^{[20](P120)};如奥尔特加认为“在审美上,眼泪和笑声都是欺骗”^{[20](P119)}。此外,亚里士多德因对“叙事效果”及其成因的关注,将情节或行动等显性要素放在首位,将人物、性格、思想等深层次或更隐性的因素放在次级位置。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诗人的职责是创造悲剧情绪或悲剧效果——“诗人通过描绘让我们享受悲剧情绪(恐惧或同情)”^{[1](P17)}。亚里士多德“力图克服柏拉图轻视感觉经验、不注重研究运动变化的倾向”^{[21](P68)},表现出对感觉经验的兴趣。

因此,申丹“隐性进程”对“情节论”的突破首先体现为对行动观为基础的情节形式的突破。申丹在对卡夫卡《判决》“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的分析中,跳脱出传统叙事分析对小说冲突关系中人与人、人与自己的分析模式,提出“人与外部环境”冲突以及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分析^[22]。但外部世界是否有独立的发展逻辑和轨迹及其与人作为个体发展间的关系等问题有待进一步论证。笔者认为对小说情节中冲突关系理解的突破,首先要跳脱出人与自我以及个体间的逻辑关系,在社会组织发展逻辑中理解个体困境和发展途径。如在分析《判决》主人公格奥尔格与朋友关系的冲突进程时,申丹提出“重要的不是朋友个人际遇的词语,而是涉及朋友社交圈的词语”^[22]。虽然朋友个人的与朋友社交圈直接相关,许多前者组成了后者,但后者属于社会群体——是出于某种目的、偏好或社会关系而形成的群体组织,且组织一旦形成其发展逻辑和个体发展逻辑不同。

比如一个基于共同利益或志趣形成的社交圈的存在逻辑,与基于个人生存发展资源获取的个体存在逻辑显然不同。正常情况下,前后两者相辅相成;但如果两者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其结果就表现为社交圈(组织)解体或个体认同危机。申丹从情节本身与其背后的社会原因入手,提出人物面对“双层打击”,即父子冲突以及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冲突,从而使文本解读由家庭结构分析深入社会结构对家庭结构的影响。因此,“双重叙事运动”的“一重”指以个体为中心的人物所面对的直接事件与冲突关系,“一重”指以社会组织(结构)为中心的人物与其所处环境的结构性关系。其实,还有更深层的关系即组织与组织间的关系,它在战争小说或政治小说中较为明显,表现为社会内部、外部组织间形成的国家与国际关系,即结构与结构的关系。上述的家庭、社会和国家三个层次实则每一个现代公民所身处的多重结构框架,人在不同结构层级中面临不同社会关系及冲突;不同层级关系有其各自的运行发展逻辑,产生相应的伦理观念。伦理理念则是我们理解关系合理性的前提。正如申丹所强调的“社会压力”对个人的影响,这种社会压力表现为社会对个体的评价标准,即什么样的人才是有价值的人或好人。如《判决》中以社会财富和地位为人的价值评价标准,即以市场运行逻辑衡量人的存在发展。这种市场化逻辑入侵到家庭伦理中造成了家庭关系的异化——父亲不能正视自己年老所代表的劳动力贬值,同时,主人公也不能从家庭伦理和情感层面思考友情与婚姻。由此可见,个体存在于多重社会关系形成的多重生存结构中,并由此产生多重伦理观念。现代个体的悲剧往往表现为主体内部或不同主体间,所产生的多种观念间的矛盾与冲突,即结构性混乱而造成的意义冲突。要理解个体悲剧及其内涵的矛盾冲突,首先就要对混乱的结构进行解构和再建构,即“多重叙事”下的多重主体运行逻辑的解构和人的存在发展意义的再建构。

最后,申丹提出“文学评论者的任务”——不仅要看到作者情节描述中的显性关系,“更要看到作者

也没有看到的关系”,即情节背后并行的“隐性进程”^[23]。这表现出当代文学叙事关注作者与读者以及文本内外多重叙事动力间的互动,以实现文本意义的最大化。小说叙事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反思首先表现为对具体生活困境的反问。对此,首先呈现的答案一般都由显性因素组成,如人物的行动和最常见的关系(如家庭伦理关系)。因此,对困境的归因也首先会形成一条由显性因素组成的逻辑轨迹和叙事进程,如情节逻辑下对人物行动和事件的简单归因。这种表层要素和简单思维模式下形成的逻辑,是对有限信息的组合,旨在满足人类本能的归因欲。显性关系呈现的首要目标不是挖掘全部信息和探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是人类对无序世界和未知发展而产生的归因欲,以满足人对安全感的需求。就像人类幼儿阶段倾听母亲讲述的故事——对现实的层层包裹与美化是对儿童有限认知和脆弱心理的保护。随着人的成长与发展,其叙事需求要从满足安全感走向自我实现与发展,首先需要超越安全需求驱动下的显性叙事。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提出,“看不到”保护我们免受不能理解的伤害——“有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保护我们免受有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的伤害。那个我们看不到的东西是文化的内在精神或内在表现。那个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是混沌,文化在混沌中产生”^{[24](P33)}。换句话说,文化在多元无序中通过某种结构建立有序和相应的安全感,而文化的演进则需要人类突破现有认知带来的安全感,通过挖掘“看不到的”或隐性内涵或叙事进程以颠覆既定的意义框架,从而形成新的意义结构与秩序。

四、结语

小说“多重叙事”的提出首先应对文学叙事学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着重分析文学(小说)叙事的特点和局限性。“小说”叙事的两面性:一方面个体人物视角、情节化逻辑和文学性描述是小说语言强大感染力和代入性的体现;另一方面,小说“细微叙事”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聚焦,使现实生活中更大的叙事主体(如群体、组织)要么作为客体存在,要么作为隐性存

在。如不深入了解社会组织、制度作为主体的运行机制,而只把其当作客体或既定的背景,无法认识个人生活困境在整个社会发展体系内的多因性和复杂性,进而产生片面的感知、认知和判断。对此,费伦曾提出文学叙事学的“新转向”是“将对个体叙事的分析置于一个更大的、通常是隐含的多种叙事选择的竞争中”^[6]。文本对个体—群体—国家“多重叙事”模式的提出,首先是为挖掘小说中“隐在的”“更大的”的叙事,以突破传统小说叙事“个人主义”的局限性;通过将其他叙事对集体本质和组织性关注与小说的个体的观照相结合,对“文本现象”进行多重解构。其次,经过“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文学叙事学从“文本外的关注”转向“文本内的语言建构”,从文学社会批判转向语言审美表达。当前研究发展的任务就是将两者结合,即“文本外真实性”和“文本内真实性”在小说叙事进程中实现多元化统一,即小说“多重叙事”研究的目的。通过对文本现象的多因分析和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最终呈现卡勒所说的文学叙事的“可述性”(tellability),即“从重要性和娱乐性上都让读者觉得这个故事‘值得一听’”^{[13](P26)}。最后,从现实意义层面讲,小说“多重叙事”旨在发挥文学叙事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人类在文学经验和认识中建立“多元化统一”思维模式,对过去认知惯性和对“不能理解”之畏惧而造成的认知盲区实现突破。结构良好的叙事能“激活意义构建过程”并实现“对意义的热忱追求”^{[25](P5)}，“多重叙事”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最终也指向对现实生活的全面认识和积极的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 [1] Aristotle. *Poetics*. Translated by Malcom Heath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6.
- [2] Czarniawska, Barbara. *Narrating the Organization: Dramas of Institutional Ident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3] 申丹. 美国叙事理论研究的小规模复兴[J]. 外国文学评论, 2000, (4).

- [4] Pace-Schott, Edward F. *Dreaming as a Story-Telling Instinc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3, (4).
- [5] 赵毅衡. 从小说叙事学到符号叙事学[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
- [6] Phelan, James. *Narratives in Contest; or, Another Twist in the Narrative Turn*. PMLA, 2008, (1).
- [7] Wellek, Rene,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Vol. 1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56.
- [8] Shiller, Robert J. *Narrative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9] 钱谷融. 《论“文学是入学”》一文的自我批判提纲[J]. 文艺研究, 1980, (3).
- [10] 王佐良, 周珏良. 英国20世纪文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 [11] 费孝通. 从人类学是一门交叉的学科谈起[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 (3).
- [12] Herman, David, et al. *Narrative Theory: 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 Athens: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3] Culler, Jonathan.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4] 赵毅衡. 文本内真实性: 一个符号表意原则[J]. 江海学刊, 2015, (6).
- [15] (宋)沈括. 梦溪笔谈[M]. 张富祥, 译.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 [16] Erikson, Erik H. *Identity and the Life Cycl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4.
- [17] 申丹. 何为叙事的“隐性进程”? 如何发现这股叙事暗流? [J]. 外国文学研究, 2013, (5).
- [18] Shen, Dan. “Covert Progression” and Dual Narrative Dynamics. *Style* 55.1 (2021).
- [19] 申丹. 双重叙事进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20] Booth, Wayne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21] 赵敦华. 西方哲学简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22] 申丹. 情节冲突背后隐藏的冲突: 卡夫卡《判决》中的双重叙事运动[J]. 外国文学评论, 2016, (1).
- [23] 申丹. 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J]. 外国文学, 2022, (1).
- [24] Peterson, Jordan B. *Maps of Meaning: The Architecture of Belief*.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25] Brooks, Peter. *Reading for the Plot: Design and Intention in Narrativ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